

第 一 章

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回顾与展望

可持续发展理念虽然最初产生于人们对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的忧虑，但其根本涵义却在于追求一种能使全体人民的福利不断改善的发展。而这意味着经济必须实现一种可以持续的增长。

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使全体中国人民的福利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实现了一种持续稳定的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资料，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由 1978 年的 3624.1 亿元，增加到 2000 年的 89 403.9 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则从 1978 年的 379 元增加到 2000 年的 7078 元。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的同时也潜藏着巨大的危机与挑战：庞大的人口基数及与此相对应的人均资源的相对不足、人力资源丰富但结构不合理、资源利用效率低、环境污染与破坏严重、经济增长速度快但增长方式粗放等等。所有这些挑战使人们在跨入新千年伊始，难免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持续性产生某种忧虑：中国经济增长是可以持续的吗？

一、历史回顾与新世纪展望

20 世纪，中国现代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中，有两件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发展进程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第一件是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二件便是发端于 70 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如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人民站起来的话，那么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则使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真正成为一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小视的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的 20 多年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不仅在中国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与改革之初的 1979 年相比，中国 2000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 7.4 倍，年均增长 9.5%；同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 5.6 倍，年均增长 8.1% 与之相对应，人均收入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在 1978~2000 年期间，中国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提高了 4.8 倍，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生活费收入提高了 3.8 倍。从人均消费水平来看 1978~1999 年农民和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分别提高了 2.85 倍和 4 倍左右。1978 年我国大约有 2.5 亿农村人口生活在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中，到 2000 年处于这一状况中的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已降至 3000 万左右。

尽管中国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存在着地区差异，比如沿海地区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增长明显地高于中、西部地区，但中国经济增长绩效并不限于沿海地区，其他地区的发展也同样引人注目。世界银行曾经有过这样一种测算：如果把中国的各个省份都拿到世界经济增长中去排序，在 1978~1995 年期间，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前 20 名都会在中国。

在经济增长保持较高速度的同时，经济增长模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逐渐从封闭的计划经

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体制。尤其是党的十四大确定了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目标之后，中国的经济结构与增长模式更是发生了令世人瞩目的变化。

(1) 这种变化首先体现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上。一般而言，全要素生产率的高低，决定一个国家经济集约的程度。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速度的快慢，反映了国民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速度的快慢。1953~1978年，中国经济增长来源中，资本投入的贡献率为99.07%，劳动投入的贡献率为20.44%，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为-13.51%，表现出典型的粗放型增长的特点。而1978~1998年期间，我国GDP年均增长9.81%，资本投入年均增长10.06%，其对GDP的贡献率为49.48%；劳动投入年均增长2.65%，其对GDP的贡献率为13.96%；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3.59%，其对GDP的贡献率为36.56%^①。

(2) 经济增长质量明显提高。这主要体现在财政收入增长率变化方面。“九五”期间中国财政收入增长率为16.2%。从表面上看，这要低于“八五”期间16.3%的水平。但如果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八五”期间的实际财政收入增长率只有2.1%，而“九五”期间则高达16.7%。从弹性系数来看，“八五”期间财政增长相对于经济增长的弹性为0.21，即经济增长率每增长1个百分点，财政增长只有0.21%。而“九五”期间相对应的弹性系数为2.01。这说明经济增长质量明显改善。

(3) 投资效益大大提高。这突出体现在资本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关系的变化上。“八五”期间，经济增长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相应的投资增长率（按不变价格计算）就要增加1.93个百分点；而“九五”期间经济增长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相应的投资增长率仅增加0.33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按2000年的价格计算，

^① 参见《中国改革报》2000.4.12

“八五”期间每产出 1 元 GDP 需投资 2.93 元人民币，而“九五”期间只需投入 0.3 元就可以产出 1 元 GDP，资本的产出效益大大提高。

(4) 经济增长对能源的依赖程度明显降低。“九五”期间我国能源消耗增长率为 -1.80%，而“八五”期间的能源消耗增长率为 5.85%。能源消耗中下降幅度最大的是煤炭，下降了 16.3 个百分点。1990 年每 1 元 GDP 的能耗为 5.32 吨标准煤，按不变价格计算，1999 年每 1 元 GDP 的能耗大幅度降低为 2.7 吨标准煤。过去认为，只要经济高速增长，能源必定是高消耗，而“九五”期间发生的变化却与这一看法相悖，这说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已经确实发生了^①。

(5) 中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大大提高，增长曲线由激烈扭曲的“雷电型”转为平缓的“流线型”。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增长共发生 11 次大的波动。其中 1979 年前的 30 年发生了 7 次，波动周期为 4.5 年，其间出现了两次较大幅度的经济负增长；改革以来的 20 年共发生不到 4 次，波动周期为 5 年以上，其间经济没有出现负增长，波幅明显减小^②。

上述变化清楚地表明，中国经济不仅在总量上有了长足的发展，而且在增长方式上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按照这样的发展趋势，达到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说的在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 2000 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 100 周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不仅是可能的，

参见《中国经济时报》2000. 9. 29。

参见《中国改革报》2000. 4. 12。

而且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那么，21世纪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将居于什么样的地位？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又会是怎样的一种情形呢？

1995年，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委托一位经济学家对世界及各国经济发展历史的统计资料进行了研究。一个有意思的结果是，早在1820年的时候，中国就创造了全世界GDP的30%，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而到了1950年，中国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下降到不足7%^①。从50年代以后，这个份额进一步大幅度下降。到1995年，在中国、美国和日本三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之和中，中国的份额只有5%。按照作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并假设美国和日本都保持1990~1995年的平均增长速度不变，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在三个国家总和中的份额将从2000年的9%提高到2010年的14%。

进一步预测表明，假设中国、美国和日本都分别以21世纪头10年的平均速度增长，20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在三个国家中的份额将提高到23%，到新中国成立100年之际的2049年将进一步提高到68%。到那时，中国从经济总量来说将超过美国和日本，成为21世纪中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实际上，根据我国一些经济学家的估计，按中国、美国和日本在1980~1991年的平均增长率推算，中国大约在2035年前后超过美国和日本，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②。

经济总量这种可能的变化，相应地会对中国人民的生活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95年中国人口总量大约

① Maddison, Angus, *Monitoring the World Economy 1820~1992*, Development Center of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Paris, 1995.

② 参见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为 12 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 620 美元，是美国同期水平的 2.3%。根据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口可能达到的总规模进行预测，可以推算出，2000 年中国人口达到 12.9 亿（2000 年人口普查数为 12.66 亿），按 1995 年不变价格计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 989 美元（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约为 904 美元），大约是美国 1995 年水平的 3.7%；到 2010 年，当国内生产总值再翻一番时，人口假设为 14.4 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为 1777 美元，是美国 1995 年水平的 6.6%。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采用各国货币的实际购买力，重新估算了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假如用这种购买力平价法替代汇率折算法^①来估算中国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实际结果要比官方公布数字高 3 倍还多。即以购买力平价法计算 1995 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 2920 美元，大约为美国当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 10.8%；2000 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为 4659 美元，是美国 1995 年水平的 17.3%；2010 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8369 美元，是美国 1995 年水平的 31%。如果以购买力平价法的预测为依据，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总量超过美国和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经济体的时间将会大大提前，即大约在 2015 年前后就会达到。这与世界银行前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萨莫斯教授的估计是一致的。萨莫斯教授还认为，中国是惟一有潜力超过美国的国家^②。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在 2000 年 6 月发表的一份题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与制度变革》的研究报告则给我

这种方法在国际学术界至今存有争议，我们不妨仅仅就其更直接反映实际消费水平这一特点，暂且一用。

参见胡祖六：《走向富强——国际上怎样估计中国的经济地位》，载《经济研究资料》1993（21）。

们描绘出了一幅更为令人振奋的蓝图：今后 20 年，在全要素生产率能够进一步提高的前提下，我国经济将继续以平均超过 6% 的速度增长，这样到 2020 年，我国的人均 GDP（按 1999 年汇率）将可望达到目前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从而大大缩短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按照这种发展趋势，我国在 21 世纪的宏伟目标不仅完全可以实现，而且“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得到的”^①。

但是，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对于未来经济指标的预测往往是一种简单的外推，即假设未来事件将与过去相同的轨迹发生。而这种假设经常是相当脆弱的。前面所作的对于 21 世纪中国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的描述，还算不上是一种严谨的预测。所以，各种预测可能存在的所有缺陷，在这里同样会遇到。例如，当我们预期中国经济总量将会超过美国和日本时，首先需要确定的是，中国、美国和日本是否在 21 世纪都继续保持过去 10 年或 20 年的平均速度增长。其实，假设美国将会继续以 2.6% 的年平均速度增长，日本继续以 1% 的年平均速度增长，的确是很脆弱的假设。但我们这里并不是要预测具体到哪一年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也不是要告诉人民届时一定要达到多少元的收入水平，而主要想指出一种趋势，即中国终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人均收入也一定会大大高于目前的水平。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要想最终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人均收入要大大高于目前的水平，必须做到：第一，经济增长率仍然将保持可以与过去相比的高水平；第二，经济增长率将继续高于

见王小鲁、樊纲主编《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跨世纪的回顾与展望》（第一章），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像美国和日本这样发达的国家。

纵观世界经济历史，欧美发达国家在它们早期的发展过程中，很少能够达到 5% 以上的年均增长率；但日本在 1950 ~ 1974 年间的年均增长率高达 10%；韩国在 1962 ~ 1989 年间达到了 9% 的增长率；中国大陆在 70 年代末到 90 年代中期增长率也接近 10%，有一些沿海省份更是高达 12%。

这种经验表明，经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如果具备了实现经济起飞的条件，完全有可能长期保持比发达国家快得多的平均增长速度。这不仅是一种可能性，而且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其原因在于，早期发达国家自始至终都必须站在技术创新的前沿阵地上；而后起国家或地区则可以借鉴和引进发达国家的现成技术，因而发展成本相对低廉。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后发优势”。但是，一个赶超的国家或地区，能否利用这种“后发优势”，归根结底在于其国内的政治、经济和环境保障。

具体到我国的特殊情况而言，能否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依赖于对这样两个问题的回答：第一，中国是否能保持改革开放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即可持续的政策保障问题；第二，中国的资源、环境能否继续支撑高度经济增长，即资源和环境的支撑问题。

二、经济持续增长的政策保障

中国的改革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最根本的不同在于，中国的改革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改革。由于有了这种政治保障，才使得中国改革的方向总是正确的。因此，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增长首先要靠继续改革和正确的改革方向来保障。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选择的激进式改革——“休克疗法”不同，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特征是渐进式的。迄今为止，这种改革方式的效果得到

了改革实践的肯定，也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高度评价。

事实上，中国政府和人民早就认识到，中国是一个人均资源相对缺乏的国家，资源和环境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制约因素。为适应这个现实，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开始发生重大改变：一是在发展方针上，强调持续和协调发展；二是在发展目标上，注意环境状况的改善；三是强调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追求经济发展速度和效益的统一以及产业结构的优化；四是在扩大再生产上，通过采取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来改进产品质量，增加品种，扩大生产能力，提高经济效益，同时防治环境污染和破坏。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想。

1994年，为了履行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上所作出的政治承诺，中国政府发表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与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相呼应，《中国21世纪议程》是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而编制的，具有很强的综合性、指导性和可操作性。《议程》指出：“可持续发展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同样是必要的战略选择，但是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发展。只有当经济增长率达到和保持一定的水平，才有可能不断消除贫困，人民的生活水平才会逐步提高，并且提供必要的能力和条件，支持可持续发展。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必须做到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即逐步走上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来。”

《议程》第一次以政府文件的形式确定了中国将从具体国情出发，从人口、环境与发展的总体联系出发，充分考虑人口、经

① 《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1994

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之间的相互协调，制定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对策和行动方案。《议程》全面论述了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系、社会体系、政策体系、法律体系、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政策机制和协调管理机制，以及可持续利用的资源与环境基础。江泽民总书记在谈到这个《议程》时说：“中国是以极其认真负责的历史责任感对待环境与发展问题的……中国将不遗余力地实施《中国 21 世纪议程》。”^① 1995 年 9 月，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所做的题为《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的报告中又指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②

把人口、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大战略，是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的革命性转变。它不仅是实现 21 世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宏伟目标的重要保障，更是中国政府和占世界 1/5 人口的中国人民对世界的承诺与贡献。

应该看到的是，在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过程中，如何协调好经济增长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的确存在着很多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方面，我国的资源总量相对于庞大的人口来说是相对匮乏的，而生态环境也已变得非常脆弱，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另一方面，为实现 21 世纪社会经济发 展的宏伟目标，我国的经济必须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由于经济条件和技术因素的制约，以及以往人们头脑中对“地大物博、物产丰富”的狭隘理

① 《中国将不遗余力地实施 中国 21 世纪议程 ——江泽民在接见参加〈议程 高级国际圆桌会议部分代表时的谈话摘要〉》，见国家环境保护局编：《党和国家领导人谈环境保护》，7 页，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6。

② 江泽民：《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解，中国经济增长还没有脱离粗放型、高浪费、高消耗的模式，重视自然资源，轻视社会资源，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上还处于传统工业化阶段，在许多方面表现出发展的不可持续性。

据统计，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因气象、海洋、洪涝、地震、地质、农业、林业等7类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目前已经普遍存在的水源和大气污染则明显地起到了降低人民生活质量的作用，尤其城市的大气质量，其污染水平已远超出国家规定的标准。

因此，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虽然具备了可靠的政策保障，但考虑到人口、资源、环境诸因素之间的协调关系的重要性以及该问题在现阶段表现出的严峻性，中国经济能否保持持续增长的势头，还依赖21世纪的中国将面临什么样的人口、资源和环境条件。

三、经济持续增长面临的人口条件

如果把经济学意义上的可持续性定义为人均福利水平随时间变化而增加或至少不下降的话，那么至少从表面上看，实现这种可持续性与人口的数量及增长速度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在一个不断增长的人口中，要使每个人所享受的福利水平不下降，就要求经济以不低于人口增长率的速度增长。如果经济增长率低于人口增长率，人均所享受的福利水平必然会下降，更不用说一个停滞或负增长的经济了。

假设人类的总福利是一块已经做好的蛋糕的话，人口问题实际上就是关系到有多少人分蛋糕的问题。毫无疑问，人口越多每个人能够得到的份额就会越少。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蛋糕是需要人来做的，没有人也就不会有蛋糕，更谈不上如何去分蛋糕。人口多，蛋糕很大，一个人所能够分到的份额并不一定就

少；人口少，但蛋糕更小，每个人所能分得的份额并不一定就比前一种情况下多。而如何使蛋糕变大就是一个经济发展问题。只有蛋糕不断被变大，也就是说经济不断发展，人们享受到的社会和经济福利才会不断增长。

1. 人口数量和质量：有喜有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国民经济高速稳定的增长带动了其他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与改革开放前相比有了很大提高，综合国力也大大加强。在这一过程中，计划生育国策实施导致的人口增长速度下降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据中国科学院国情小组计算，人口增长率每降低 0.1 个百分点，人均 GDP 即可增长 0.36 ~ 0.59 个百分点。根据《中国计划生育投入与效益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成果，1971 ~ 1998 年，在计划生育和社会经济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共计少生人口 6.38 亿。其中因计划生育而少出生的人口为 3.38 亿，由此为全社会节省了数以万亿计的抚养费用。这项研究通过对我国 0 ~ 16 岁少年儿童抚养系数的回推计算得出，在 1971 ~ 1998 年的 27 年中，由于实行了计划生育，中国少增加了 3.38 亿人，并且由此为全社会节约了 7.4 万亿元人民币的抚养费用。同期，我国计划生育的财政和非财政投入为 905 亿元，即在计划生育上每投入 1 元便可节省少儿抚养费 82 元。

在 1979 ~ 1998 年的 20 年中，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普遍实施，我国人均 GDP 由 417.7 元增长到 6490.21 元，居民消费水平由 227 元增加到 3094 元。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同期人均 GDP 只能从 363 元增加到 4099.5 元，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则只能从 197.3 元增加到 1954.4 元。由此可见，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也就是说对将“蛋糕”做大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因此，经过 70 年代初以来的近 30 年的努力，我国人口的增长模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

料，2000年我国总人口为129533万人，与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相比，人口增长了11.6%，年平均增加1279万人，年均增长率为1.07%，比80年代末下降了4个千分点。这表明，我国控制人口过快增长政策取得了明显成效，不仅平稳度过了第三次人口生育高峰期，有效控制了人口的过快增长，而且开始进入低生育水平阶段，这就为21世纪的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人口环境。

同时，我国的人口素质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我国人口的粗文盲率为6.72%，比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下降了9.16个百分点。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由1990年的1422人增加到2000年的3611人，增长154%；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由8039人增加到11146人，增长39%；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由23344人增加到33961人，增长45%；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则由37057人减少到35701人，下降4%。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在整个90年代，我国人口的素质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增加更快，其增长速度之快是建国以来少有的。这种变化表明，我国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人群在快速扩大，这就意味着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而这对于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而言，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人口质量或者说人力资本积累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异。中国的发展历程和现实状况也证实了人力资本对发展的巨大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每10万人口中拥有的各种教育程度人口数、妇女受教育程度等方面都有很大提高，文盲率则大幅度下降，这不仅对经济的增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且对于人口增长速度的降低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尽管如此，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人力资源的开发、人力

资本投资和由此决定的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仍然存在着相当大差距。

在当今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中，由于人力资本投资加大而导致的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20世纪初，在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中，科学技术对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贡献率仅占10%~15%左右，到20世纪中期，其贡献率上升到40%左右。而80年代以后，科技进步的贡献率已大大超过了物质资本和劳动力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占60%~80%以上，在有的高新技术部门，甚至占到100%。而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在这方面的差距相当明显。据有关的研究，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72%依赖于物质资本的投入，只有28%是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取得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丰富的人力资源与低水平的人力资本投入的“倒挂”现象，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人力资源转化的过程中，对人力资本投入的严重不足。

对人力资本投入的不足，使丰富的人力资源不能迅速、直接地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由此导致了中国人力资本存量和质量较低。据有关的统计，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每千人中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为4.7人，以色列为4.4人，美国为3.8人，加拿大为2.3人，欧洲共同体国家为1.9人，亚洲新兴工业国家或地区为1人，而我国只有0.4人，差距相当大。我国6岁及以上人口的受教育年限1999年为6年，虽然比1990年的4.5年有明显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在我们为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而付出艰苦努力时，日本早在1907年就普及了六年制义务教育，而美国目前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已达到了大学一二年级的水平，这就为这些国家强大的科技实力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我国人口素质还存在着很大的城乡差异。据国家统计局的有关调查，1999年我国农村的小学与初中文化程度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为72.39%，高中文化程度人口占4.68%，大专以上文化

程度人口的比例仅为 0.32% 农村文盲率为 13.8% ;而城市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人口的比例为 28.6% 文盲率仅为 7%。

我国人口与发达国家人口在科学素质方面的差距也很大。1992 年国内有关机构曾按国际惯例对我国国民的科学素质进行了一次测试,结果显示,对科学知识的回答正确率为 40.3%,在进行过此项调查的英、法、葡、丹麦等 15 个国家中名列最后;能正确理解科学方法的人的比例为 2.5%,而美国 1990 年进行的同样调查的结果为 13% ;在对待科学知识的兴趣方面,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或“科技报道和话题”感兴趣的比例均小于对政治、社会、体育、文化的新闻或话题感兴趣的比。另一项以青少年为对象的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城市中的青少年虽然对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的重视程度都较高,但是在实际投入上却明显不足。从阅读科技书刊的情况看,在职青年平时读一点专业书籍的尚不足半数,平时一点也不读的人近 1/6;在校学生中,平时常看一般科技书的人尚不足 1/6。

这种状况表明,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存在着较大的缺陷,这些缺陷,特别是那些属于较深层次的结构性缺陷,有可能对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可持续发展形成极为消极的影响,使可持续发展缺少灵魂和原动力,以至失去发展的后劲。

2. 年龄结构:优势和挑战

根据预测,从现在到 21 世纪中叶,我国 15~59 岁人口将保持在 8 亿~9 亿,尤其在 2010 年之前,劳动力的年增加量都在 1000 万人以上。15~29 岁年轻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 35% 以上,15~44 岁的中青年劳动力占 70%(表 1-1)。应当说,在低抚养比时期,我国的劳动力资源状况对经济的发展是极为有利的。关键是如何把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尽快地转变为实际的生产力,这是我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认真对待并要努力解决的问题之一。

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社会上存在的大量失业人口就意味着社会抚养比重的加大，而这对经济的持续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表 1-1 未来 50 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结构变化

年份	人口规模 (百万人)				占劳动年龄人口比例 (%)			
	合计	15~29岁	30~44岁	45~59岁	合计	15~29岁	30~44岁	45~59岁
2000	822.28	312.40	315.19	194.69	100	37.99	38.33	23.68
2010	935.38	337.99	333.50	263.89	100	36.13	35.65	28.21
2020	970.04	329.23	306.17	334.64	100	33.94	31.56	34.50
2030	917.86	278.98	344.25	294.63	100	30.39	37.51	32.10
2040	898.50	283.00	293.18	322.32	100	31.50	32.63	35.87
2050	849.43	256.50	277.28	315.68	100	30.20	32.64	37.16

资料来源：杜鹏著《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开发利用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的一个最大挑战就是如何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中国长期以来就存在着人多耕地少的矛盾。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加上农村人口的增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大幅度增加。虽然由于改革开放后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农村人口的增长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是农村人口基数大，其人口总数仍然增长了 9.9%。而这阶段农村劳动力总数的增长更为迅速，从 1978 年的 30 638 万人增加到 1998 年底的 45 961 万人，增长了 50.02%。目前估计农村剩余劳动力总数在 2 亿人左右。规模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不仅给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造成了压力，而且以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主体的流动人口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产生了许多影响。

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人口

向城市的流动必然会发生。我国目前发生的情况，也印证了这一规律。但是，鉴于特殊的国情，我们在处理这些问题时的政策选择就显得极为重要。对于流动人口来说，正确的政策选择应该是，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流动，并尽可能地加大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使农村经济具备持续发展的原动力，为农村规模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进而提高农业本身对剩余劳动力的消化程度；同时，逐步开放劳动力市场，改革不合理的户籍管理制度，为加快农村人口城市化的进程创造必要的条件。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人口城市化水平也是重要的标志之一。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在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中，一些政策的改革和实施具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必须逐步对现行的不合理制度进行改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发展的机会。

由于生育率的快速下降，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发生了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将是深远的。其中影响最明显的是人口结构老龄化。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是低生育率的必然后果之一。虽然目前已完成现代人口转变的西方发达国家都是老龄化国家，但这些国家的老龄化过程是渐进的，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情况下逐渐发生的，与此相适应，这些国家整个经济社会支撑系统比较完备。而我国则不同，老龄化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还相对较低的情况下，由于强大的政策和行政干预导致的生育率快速下降的作用下出现的。虽然这个过程也是渐进的，但是远快于发达国家。

根据有关的统计，1999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已超过10%，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也已接近7%，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衡量，已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表1-2）。而且据预测，假设生育率稳定在目前的较低水平，2005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将上升到10.8%，人口年龄中位数将上升到32.4岁；这两项指标在2010年将分别达到12.2%和34.5岁；2030年可达